

黄海学术论坛

第二辑

主 编 陈金钊
执行主编 周 怡

HUANGHAIXUESHULUNTAN
HUANGHAIXUESHULUNTAN

学林出版社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ACADEMIC FORUM

第二辑

主 编：陈金钊

执行主编：周 怡

副 主 编：吴文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海学术论坛(第二辑)/陈金钊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 11

ISBN 7-80668-661-4

I. 黄... II. 周...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095 号

黄海学术论坛(第二辑)



主 编——陈金钊

执行主编——周 怡

责任编辑——叶 刚 陈宁宁

封面设计——田中雨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青浦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0 万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数——11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661-4/G·233

定 价——28.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建军

副主任：王吉法、陈金钊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仵从巨 孙武安 任怀平 刘 明

曲洪启 吕爱权 朱桂华 闫涛蔚

张东辉 姜爱丽

目 录

文学研究

- 试论清初对明代文学史的反思.....袁 进(1)
鲁迅: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高旭东(16)
金圣叹《水浒传》评点中的修辞学视角.....泓 峻(31)
胡风的人格理论特质.....红 苇(41)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自传色彩.....张彩波(54)

语言研究

- 古汉语“乘”字简论.....邵文利(60)
浅谈试论“糊(糊)口”一词的形成、发展与规范.....杜丽荣(70)
浅谈英文新闻标题修辞.....张学智(76)

学者序跋

- 《新时期文艺争鸣论集》自序.....栾昌大(81)

中国文化研究

- 辨“有生于无”.....聂中庆(89)
孔子的“命定论”及其目的与意义.....张德苏(95)
论吕澂对原始佛学个体化特征的分析.....刘成有(104)

东北亚文学研究与文化交流

- 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文艺思想.....周 怡(109)

明治诗人三岛中洲	高文汉(125)
简论夏目漱石的“余裕”	郭秀梅(137)
论茅盾的散文创作	(韩)崔成卿(142)
东亚文化价值观研究之争:文化冲突与融合	薛 晨(148)

东北亚政治经济研究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与东亚	田中青(163)
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障碍	金艳华(174)
浅析韩国电子商务现状	崔 昕(182)

哲学政治研究

可持续发展——迫于压力的一种被动选择	马春霞(189)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相互形塑	沈湘平(197)
把休闲文化纳入先进文化的发展轨道	吴文新 孙武安(210)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丁士峰(219)
论“三个代表”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李建宁(225)

法律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律史阶段划分问题	王 强(232)
试论我国物权变动的安全制度体系之构建	董学立(241)
西方法律解释思想	
——20世纪上半期的回顾与思考	焦宝乾(257)
非全时工作制论析	安玉萍(267)
中国经济法之争的内涵及原因分析	张旻昊(274)

经济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宣 峰(283)
制度创新:矫正中国收入差距偏大的根本途径	杜宏宇 岳 军(289)
稿 约	(301)

文学研究

试论清初对明代文学史的反思

袁 进

[摘要] 本文着重论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清初文学史家如何反思明代的文学史演变,系统总结了明代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并且进一步提出文学史发展的关系、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必要条件。其中提到的一些关系,如师承与创新,学问与才情等等,实际上也预示了后来清代文学史学的问题。

[关键词] 文学史、时代、才情。

[作者简介] 袁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6

明清之际,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两大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代。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贯穿此间。特别是民族地位的巨变,不仅使广大汉族人民蒙受了屈辱和灾难;而江山易主,国破家亡,更使原来的统治阶级——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巨大的创伤。这个时代精神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汉族地主阶级中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文化素养,而又活跃、敏感、善于思考的积极成员,在事变前就觉察到潜伏的危机而思作挽救之计,在事变过程中也是奔走呼号,掷首沥血。劫后的幸存者,歌哭之余,痛定思痛,以理性的沉思,批判、审视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借以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的思想家。也有如钱谦益者,在剧烈的民族斗争中首鼠两端,变节投降,又难免心怀故国之思,在述学论史时,不时露出激越真实的心声。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戏剧性的易代沧桑改变了文人们的心路历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笼罩中的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对有明一代的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流程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在整个文学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末年,江南一代是当时人文荟萃之地,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以

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在吴地鼎足而三。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牺牲了,钱谦益以降清而又暗中抗清,收门人数千,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人之一。他在政治上反复失节,但在文学上却是当时颇有见解,开一代风气的学者之一。他少年时受到明代复古主义思潮影响,后来才有所醒悟,因此他对明代复古主义思潮的流弊,也就看得更为分明。他自己回忆:“余少壮汨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俗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辄,稍知向方”。^[1]俗学指的便是复古主义的影响,他是听了归有光的讲论,才摆脱了明代的复古主义,认识到自己创造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逼变”。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是在总结明代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面对明清之际文学思潮新变的大势,文人中不管是遗民、出仕新朝的权臣、抑或是既已降清、依然心怀明室的人物,大都以一种积极、负责的态度,对诗歌、散文如何创作和发展诸问题畅所欲言,各述己见。而钱谦益对明代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史的总结,带有较强烈的文学史的倾向,说明批评家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史的观念和比较自觉的历史意识。钱谦益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对明代诗文创作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的总结。对主要流派的兴衰、文学理论的演变、代表作家的得失,逐一地具体地作了批评。其二,他集中概括了明代文学的正反面的经验教训,将它上升为理论,从而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转变学风、转变文风的积极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在文学史学理论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有的至今还又启示意义。

钱谦益论述有明一代的文学,把它看作一个盛衰交替、流派纷争、呈波浪式向前推进的过程:

国初之文,以金华、乌伤为宗;诗以青丘、青田为宗。永乐以还,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起,力排西涯以劫持当世而争黄池之长。中原少俊,交口訾警,百有余年,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近代訾警空同者,魑吟鬼啸,其云雾尤甚于空同而不自知也。《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牧斋初学集》卷 83)

钱谦益论明代诗文以初期为一盛,其时的代表作家,于文则首推宋濂

(金华)、王祎(乌伤);于诗则首推高启(青丘)、刘基(青田)。钱氏之推崇宋、王,主要是因为他们能继承唐宋金元以来的古文传统,再子机有其“真”(语言真切、感情真实),与秦汉派之摹拟剽夺不同。而高启之诗,一如“秋空飞隼”又如“出水芙蓉”,“思致清远”“才气俊逸”。刘基诗则“魁垒顿挫,使读者愤张兴起”。钱氏论明初诗人,虽高、刘并列,实则认为真正代表明初诗风和艺术成就的是高启而非刘基。其他如杨基、张羽、徐贲三人虽与高启并为“吴中四杰”,但他们的成就更在高启之下。

“永乐以还”,明代诗文创作出现第一次衰落。《列朝诗集》甲集刘崧小传云:“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崧),闽中则张古田(以宁),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也肤弱而无理。余录二公诗窃有叹焉”。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重臣,“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1]形貌雍容,内容单调,既少妙思,又乏奇气,这便是永乐、成化年间风靡一时的“台阁体”。

明初诗文一衰后使之复振的是李东阳。钱氏认为李东阳是继明初宋濂、刘崧之后而起的文坛领袖,又是明代诗文创作第二盛世的代表作家。钱编《列朝诗集》将李东阳列为丙集之首,认为他的诗文诸集“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是“国家休明之运”的反映。肯定他“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又认为其诗作“有少陵,有随州、香山,有眉山、道园,而其为西涯者自在。”^[2]意即李东阳学古而能化古,比起后来的前后七子,显然要高明。

继之而起的是以复古求改革的前七子。钱氏认为前七子特别是李梦阳的理论与创作皆不足为道。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中用发展运动的宇宙观批判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从诗的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出发,批判李梦阳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其曰:“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之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字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事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此外,钱氏还集矢于前七子党同伐异,霸气十足的门户作风。他不仅说李梦阳“诋谏先正,以劫持一世”,在《列朝诗集》王廷相、张凤翔、张治道等人的小传中,一再列举事实抨击七子“党护曲论”“不惜公是”“尊今卑古,大言不惭”,前七子的理论之谬,作品之腐,作风之霸,使“弘正以后,伪谬之学流为种智”,以致“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以此

断绝”。^[4]显然,不顾前七子复古求变的积极因素,将明中后期学风、文风之坏归咎于前七子。这是有失公允的。

前七子之后的明代文坛,分为两股潮流:一为前七子的批判者,以唐宋派为代表,一为前七子的继承者发展者即所谓“后七子”“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流。对前者,钱谦益赞扬有加,如说李开先与赵时春等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5]转变了前七子剽拟文风。与此同时,钱氏指出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是“通经史,谙世务,往往为通儒魁士,以实学有闻”,以古学、实学逆转了不正之学风。而对后者,钱氏则极少许可,对李攀龙、胡应麟的批判尤为激烈,其斥李于鳞“僻学为师,封己自是,限隔人代,揣摩声调”,贬胡的诗学著作为“攀附胜流,容悦贵显”“耳食目论”。尖锐之中偏颇显而易见。

至于公安派与竟陵派,钱谦益也是褒贬不一。其论袁宏道“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七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把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看作是明代进步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说他们从理论上扫除了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迷雾,使诗文创作得以真实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徐渭、李贽、汤显祖虽然曾经提出过进步的思想或理论,但由于客观原因,特别是文学自身演变的客观进程的限制,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代文风,公安派完成了这一任务。钱谦益充分肯定公安派的历史功绩,显然是正确的。

但对于竟陵派,钱氏则予以强力抨击。他在《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中说:“尝取近代诗而观之,以精深奥僻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刻剥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语,噍音促节,此兵象也。鬼气出、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气运从之,有识者审声歌风,岌岌乎有衰晚之惧焉。”(《牧斋有学集》卷31)他甚至将竟陵派之诗称为“诗妖”:“今天下兵兴盗起,民不堪命,识者以谓兆于近世之诗歌,类五行之诗妖。”^[6]不过,钱氏对竟陵派的批判,独到之处在于从审美角度的审视。其《刘司空诗集序》云:“万历之季称诗者,以凄清幽眇为能,于古人之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者,皆皆髣抹杀之,以为陈言腐词……甚矣诗学之舛也。譬之于山川,连冈堕障,逶迤平远,然后有奇峰仄涧,深岩复壁,窈窕而忘归焉。譬之居室,前堂后寝,弘丽靓深,然后有便房曲廊,层轩窈突,纤远而迷复焉。使世之山川,有诡特而无平远,不复成其为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窈突奥而无堂寝,不复成其为人世。又使世之览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诡特,则

必将梯神仙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窈窕奥，则必将巢木杪，营窟室，终之于鼠穴而已。今之为诗者，举若是。”钱谦益认为，由于竟陵诗派鼓吹者审美趣味的僻与怪，使诗歌创作的路子愈走愈窄，思想情感的抒写愈变愈狭。结果呢，求深反浅，求新反陈，僻涩蒙昧，堕入魔道了。尽管钱氏对竟陵派的鞭挞不遗余力，但对竟陵派与公安派的关系、功过却表述得相当分明。一方面肯定竟陵派与公安派的承传关系，另一方面从思想上艺术上作了本质的区分，这比那些将公安、竟陵视为一体，笼统指责的论者高明了许多。

综上所述，钱谦益对明代诗文创作的历史描述，对主要流派的分析批评，具有较为完整的系统性，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理论家。从钱谦益对明代文学史的勾勒与评述中，不难看到贯穿于所谓盛衰交替、流派纷争中的复古与新变两种现象的弊病，复古者因师古而易陷入仿古拟古的窠臼，因而窒息了诗的生肌；寻求新变者往往因师心自用易落入纤碎生僻的泥淖，同样也窒息了诗的生肌。基于对明代文学师古与师心所产生的弊病的深刻认识，钱谦益为此寻找着转变文风学风的药方。

其《题怀麓堂诗钞》专论近代诗病曰：

近代诗病，其证凡三：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俚句，支绲蹈袭，此弱病也。剿唐选之余沈，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穴，晦昧结情，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牧斋初学集》卷83）

近代诗病凡经三变，所谓“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即言明代文坛上思潮兴替，流派诞生，都是为矫正时弊因病发药，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对前人的文学实践必须作出客观的批评，对他们的理论必须进行审慎的抉择。钱氏在《牧斋有学集》卷15《鼓吹新编序》中以新药、旧药作比，用得对症皆为好药，那么明代文坛上的诸流派为什么会救此失彼，愈变愈下呢？究其原因，钱氏认为在于治标不治本。他在《族孙遵王诗序》指出：“今之名能诗者，庀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变，引声度律惟恐其不谐美，骈枝斗叶惟恐其不妙丽，诗人之能事可谓尽矣。而诗道固愈远者，以其诗皆为人所作，剽耳佣目，追嗜逐好，标新领异之思侧出于内，诤世炫俗之习交攻于外，……虽其中写繁会，铺陈绮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已

薄而不美,索然无余味矣。”(《牧斋有学集》卷19)因此,“非有反经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则终于胥溺而已矣!”(《娄江十子诗序》见《牧斋有学集》卷20)“反经”“循本”就是钱氏提出的治本灵丹。

“近代文章河决鱼烂”的严重局面肇自“离经讲道”“师今非古”“学术蛊坏,世道偏颇”,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创新与继承的处置不当。经学的乖谬,“圣道”不明,决定了人心、世运,也决定了文学的命运。因此以“反经”转变文风,即恢复被歪曲了的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使“圣道”复明。总之要转变文风须先改造学术;要振兴文学须先正经学。这种观点明确地显示了从明到清学术思想、文学理论转变的痕迹。

何谓“循本”?天下文章作为天地元气与人之灵心激荡的产物,换句话说是自然、社会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相互激荡,相互击发而产生的。这样的相摩相荡即是“萌坼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见《牧斋有学集》卷49)。所谓“循本”之“本”,主要是由灵心、世运、学问三大要素共同构成的。正所谓“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7]

强调“灵心”,可见钱氏对于人之“性、情、志、气、才”等主观精神的重视,这是人感物而动的天性所在,也是萌于志、发于气、兴于诗的能力。

强调“世运”,可见明清易代故国之思的客观事实对钱氏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身世偪侧”、“时命连蹇”、天地翻覆、历史巨变对人之“灵心”具有强有力的“击发”作用,所谓“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8]乃是要求以时代悲歌咏叹兴亡历史,如不是时穷境迫,深情激荡,“才力愤盈”,何以会有这样的“诗史”?故“古之人,其胸中无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来,政治之污隆,道术之醇驳,苞罗旁魄,如得一二乃其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无意于文而文生焉,此所谓不能不为者也。”^[9]

强调“学问”,可见钱氏重视对历史传统的积淀,这既是对明代复古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扬弃,也是对公安末流、竟陵弊端的针砭。其意在用“古学”去矫正明代“伪学”“谬学”“俗学”之弊,在在针对公安末流师心自用、学无根柢。他在《赠别方子玄进七序》中既批评公安末流、竟陵小生“人自为学,家自为师”,也直斥前后七子“务华绝根,数典忘祖”。他提倡的是“学倡九流,书破万卷,要归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则,宣导情性,陶写物变”,其意正在于正本清源,转变文风。而“古人之学”在于“牢笼古今,极命庶物,沿流溯源,文从字顺”。“古人之识”在于“区明风雅,别裁伪体,标举兴会,萌茁时

运”。“古人之志”在于“摆落悠悠，望古遥集，晞发咸池，濯足东海”，（《宋子建遥和集序》见《牧斋有学集》卷17）这自然是“为陋”“为愚”“为妄”者攀不可及的。明代诗人创作中复古、拟古、和古之作正是缺少了这样的“学、识、志”。惟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自得妙悟，才能“意象萌茁”“变而得正”^[10]在钱谦益看来，矜声律，饰文字，剽窃掌故，附会时事，拟汉魏之格调，仿唐宋之神气，不欢而笑，无病呻吟，一字一句处于安排，都属于“以能之为工”，是舍本逐末。文章只有“萌坼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境会相感，情伪相逼，为于所不能不为，才是抓住了根本，“循本”了。

所以他说：“学殖以养其根，养气以充其志，发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于温柔敦厚之教，其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根柢在乎天 地世运，阴阳剥复之几微”，才谈得上从事文学创作。钱谦益在回顾有明一代文学史演进过程时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既融汇了明代各派理论的精华，又矫正了明代各派理论的流弊，确实是明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代宗师。

钱谦益不满于现状，希望用复兴传统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走的仍是“复古”的道路，但是他的“复古”与明代的“复古”不同，他强调的是复兴古代的精神，吸收传统的养分，创作出今人的作品，而不是像明代“复古主义”那样一味摹仿古代的形式。事实上，钱谦益认为“复古”只能是复古代之精神，而不可能创作出类似古代的作品。他批判李梦阳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他“倡为汉文杜诗，以叫号于世；举世皆靡然而从之矣，然其所谓汉文者，献吉之所谓汉，而非迁、固之汉也；其所谓杜诗者，献吉之所谓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汉有所为汉，唐有所为唐，而规规焉就汉唐而求之，以为迁、固、少陵尽在于是，虽欲不与之背驰，岂可得哉！”^[11]这就引出一个史学观念的命题：后人是否有可能完全回到历史原初形态。钱谦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后人只能学古人精神，吸收古人养分，而不可能创作出与古人完全一样的作品。但是后人得古人精神的作品，其价值也并不亚于古人。“夫文之必取法于汉也，诗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汉之文有所为汉者矣，唐之诗有所为唐者矣。知所以为汉者，而后汉之文可为，曰为汉之文而已，其不能为汉可知也；知所以为唐者，而后唐之诗可为，曰为唐之诗而已，其不能为唐可知也”。只有理解了汉文、唐诗的精神，创作才有可能达到汉文、唐诗的成就。“自唐宋以迄于国初，作者代出，文不必为汉而能为汉，诗不必为唐而能为唐，其精神气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其间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

尽管有着制艺八股的干扰,道学家对文学的干预,“然而文章之脉络,画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固非俗学之可得而乱也。”^[12]这样,钱谦益虽然主张“复古”,但其内涵与明代的复古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他实际上只是主张以古代优秀作品为典范,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其立足点则是在发挥今人的创造性上。是“通古今之变”。因此他充分肯定明代发挥自我创造力的创作:“夫本朝非无文也,非无诗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汉而非者,为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诗,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为本朝之诗,人尽蔽铜其心思,废黜其耳目,而唯繇学之是师,”^[13]他看出提倡一味仿古的作品,会禁锢人们的创造力,扼杀优秀作品的问世。学古只能学精神,使自己的创造力有所凭借。钱谦益真正说明了文学创作“古”与“^[2]今”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既肯定古代经典,又宏扬后人创造力的价值标准。表现了一种“通变”的新型的文学史观。比起杜甫的“不薄今人爱古人”,似乎又进了一步。

钱谦益主张:文章的变化与天地变化连在一起,“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14]天地与人心的变化,造成了文章的变化。“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诊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15]处在明末清初的特殊环境,人们自然要呼唤忠臣志士的文章。这就为今人文学创作的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吴伟业主张:“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陈百史文集序》,《梅村家藏稿》卷27,清刊本)稍后的尤侗认为:文章变化的依据,就在于天地的变化。“人以天地之文造文,文与天地始,与天地中,与天地终”。因此,“天地变而世变,世变而文变。使世而不变,则揖让之后无征诛,征诛之后无封建,封建之后无郡县,郡县之后无割据矣。”文学与政治同样,由世变而文变,“使文而不变,则典谟之后无誓诰,誓诰之后无论策,论策之后无诗赋,诗赋之后无词曲,词曲之后无制义矣”。(《己丑真风序》,《西堂全集》卷4,清云溪阁藏本。)^[16]“天地变”、“世变”、“文变”这三者构成了文学史变化的线索。这就从钱谦益等人的论述上,引申出类似明代李卓吾的文学发展论。文学的演变有了比较充分的合理性。

钱谦益另有一个重要的主张:文学史家必须有博大的心胸,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提倡多读书。“仆尝观古之为文者,经不能兼史,史不能兼经;左

不能兼迁,迁不能兼左;韩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韩。其于诗,枚、蔡、曹、刘、潘、陆、陶、谢、李、杜、元、白、各出杼轴,互相陶冶。譬诸春秋、日月,异道并行。^[16]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就是在不同风格上同时进行的,不可能定于一尊,也不应当要求文学定于一尊。文学史家必须正视这一点,充分肯定不同风格各自存在,并行发展的合理性,文学的丰富性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种丰富又必须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17]文学创作应当“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毕矣”。^[18]这种以儒学为基础的兼容并包的文学史观,显示了博大的心胸,开创了清代集众家之大成的风气。钱谦益是开清代风气的学者,清初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有过与他相类似的论述。

在文学史研究上,黄宗羲很可能受到钱谦益的影响,但是他更强调“道”在文学中的作用。黄宗羲认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19]元气既包括自然,更包括人事。元气随时代而变动,文章自然也随时代而变动。“余观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盖画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恶不与焉。其所变者,词而已,其所不可变者,虽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变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后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变,而以唐之前后,较其优劣,则终于愤愤耳”。千古如一日所不可变者,是文章内部所蕴涵的“道”,也就是义理。“文虽小技,必由道而后至”。他主张文章的法度可以变,但是文章内部所蕴涵的“道”,决定文章价值则是不变的。因此他批评那些主张明文衰落在缺少法度的人,是“以唐之前后,较其优劣”,明文的问题在缺乏思想深度:“夫明文自宋、方以后,直致而少曲折,奄奄无气,日流肤浅,盖以不容不变;使其时而变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而三叹出之,无论沿其词,与不沿其词,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语,自任起衰,仍不能脱肤浅之习,吾不知所起何衰也?”但是光有思想、法度也不行,还须要有丰富的感情。“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因此,“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郭廓耳”。^[20]他认为明代古文的毛病,就在于“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与为肤浅之归而已矣”。^[21]即使是明代古文最为人称道的归有光,黄宗羲也认为他的文章“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22]这是因为明代三百年来,士大夫专注于科举,考八股文,用余力来作古文,所以成就无法与前代相比。

因此,黄宗羲的文学史观主张在思想与感情上并重,他评论古代的文选:“前代古文之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为最著。文选主于修辞,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精拮华,亦选之鼓吹;文鉴主于政事,意不在文,故题有关系而文不称者,皆所不遗;文类则苏天爵未成之书也,碑版连牍,删削有待”。他自己编的《明文案》,便以“情至”为标准:“夫其人不能及于前代,而其文反能过于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辄,唯视其一往深情,从而捃摭之”。因此,他并不局限于名家作品,而认为:“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23]在强调至情上,他实际上继承了明代对“情”的推崇,他是清初三大家中,晚明色彩最重的一位。

黄宗羲的文学史观另有一个特点,他比较注重文学史的连贯,而不主张简单地以时代来区分文学的高下。这其实也是针对明代的“复古主义”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说“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24]每一时代都有好作品,也有坏作品。自己要学会分辨优劣。时代与时代之间,本来是连贯的,文学史一直存在着继承关系。不应当凭着自己的师承,忽视这种继承关系。“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学唐者唯宋”。只有“心游万仞,沥液群言,上下数千年之间,始成其为一家之学”。^[25]他实际上认为,只有博采众长的作家,全面继承文学史的作家,才能成为大作家。黄宗羲的这一主张,当时未必有很大影响,但对后世,尤其是近代的宋诗派、同光体,影响很大。他们后来都很注意探讨宋诗的师承,一直上推到唐,甚至六朝,力图在继承宋诗的基础上,扩展自己继承传统的范围,博采众长。

黄宗羲很注意吸取古人的成果,同时他也非常反对雷同。“世人多喜雷同,束书不观,未尝见大家源流之论,作半吞半吐之语,庶几蕴籍,以为风雅正宗,不亦冤乎?”(《陆轺侯诗序》,《黄黎洲文集》,中华书局本)他赞成古人所云:诗文最忌思路太熟,思路一熟便很容易雷同。只有沿着自己的思路,不断创新,方能写出优秀作品。

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也反对雷同,他提出:“《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26]这也是针对明代摹拟剿袭的复古主义,明代的复古主义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因为不能雷同,需要创新,创造出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于是文学就必然产生变化,从而产生文学史的演变。创新成

为文学演变的内在动力。这样，顾炎武就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那么，怎样解释这个“势”呢？顾炎武倒并没有把它与“天地”与“人事”结合起来，象清代许多士大夫所做的那样，拉大旗作虎皮，而是很实际地提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拟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27]换句话说，也就是作家的创新意识决定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顾炎武的这一主张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它是近代王国维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先声。不过顾炎武更喜欢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文学，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28]他以“有益”治乱来作为衡量文学史的标准，“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顾亭林诗文集》卷4，中华书局本）因此，他以汉代为例，主张“文不贵多”，因为“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益于世，其不传宜矣”。文章以少而兴盛，以多而衰落。两汉的文章，东汉文章多于西汉，但是东汉的文章不及西汉，反倒是衰落了。“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29]他针对明代文章的弊病，一针见血的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30]文人因为现在的地名不古，借用古代地名；因为现在的官名不古，舍去大家用的字，借用古代通用的字，“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摹仿《楚辞》的人，其作品必定不如《楚辞》，摹仿枚乘《七发》的人，其作品必定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邯郸学步之说也”。（同上）顾炎武有一个类似钱谦益的见解，他也认为：今人不可能完全创作出古人的文章，“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31]尽管古人取得很大成就，后人一味模拟古人也是不会有出路的。他批评友人的诗文：“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之十七，《顾亭林诗文集》卷四，中华书局本）这也意味着：要想创作登峰造极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摆脱依傍，充